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邓力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邓 力 群

内 部 读 物
注 意 保 存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邓 力 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印张 71,000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5230·016 定价：0.40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1)
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17)
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	(57)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68)
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	(79)
关于经济体制问题·····	(89)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103)

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收集了陈云同志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一段时间的重要文稿，编印成书，就是大家拿到的这一本《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中央书记处决定先在党内发行。同志们正在学习这本书，我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供大家参考。

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收进这本书的文稿，大部分是陈云同志的讲话，有些过去听过，有些过去看过，当时就觉得很好，而且按照他讲的去做，工作就见效。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编辑文稿的过程中和这本书出来以后，先后看了几遍，心情都很激动，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们党有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总结了我们经济工作的经验，凝结成了这样好的文章，而且现在能够编印出来供广大干部学习；难过的是，陈云同志这些好的意见，虽然有的时候付诸实行，但也有很多时候被弃置不用，甚至受到批评，

* 这是一九八〇年十一至十二月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课的记录稿。一共讲了四次。整理时作了一些增删和修改。

结果使得我们的经济工作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看来，如果解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工作一直由陈云同志主持下来，照他的正确主张去做，那末，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同现在的情况比起来，就会大不一样。多年以来我们受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经济的发展多次反复，几经折腾，这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反映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当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如果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身上，似乎我们毫无责任，在接受经验教训的时候可以毫不在意，那就不可能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教训。这对于我们改进经济工作，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要声明一下，刚才讲的这一节的题目——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不是对陈云同志的全面评价，只是因为今天是讲这一本书，而这本书收集的都是经济方面的文稿。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尚。从三十年代初开始，陈云同志就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遵义会议后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长期在中央做领导工作。在我们一般同志的印象里，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很有成绩，但很少同志知道陈云同志在其他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陈云同志曾经主管过组织工作，在党的建设和干部的培养上，有过许多建树。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

在东北工作。东北扭转被动的局面，最有名的就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保临江”就是陈云同志领导的。“四保临江”的几个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军队。陈云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全国解放以后，陈云同志主要是管经济方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在党内外都是公认的。这里，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目的是帮助大家理解这本文稿的一些历史背景。

首先讲周恩来同志怎么看待陈云同志。一九四九年初，陈云同志离开东北，调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我听说，这是周恩来同志建议的。后来，政务院成立，周恩来同志出任总理，陈云同志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经济工作。那个时候，国民党留下的通货膨胀，简直象脱缰野马。国民党也好，美国人也好，都说这个通货膨胀的局面，共产党没有办法收拾。当时，在财经上不仅要收拾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而且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抗美援朝，又增加了军费开支。财政收支能否平衡，市场物价能否稳定，很多同志心里都没有底。可是，出乎国内外很多人的意料，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些令人发愁和担心的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办法，很多是陈云同志提出经中央讨论决定下来的。

一九五三年财经工作会议讨论粮食问题时，大多数省份建议实行差额调拨的办法，就是粮食多的省份定下

来每年调出多少，粮食少的省份定下来每年中央拨给多少。讨论来讨论去，决定不了，最后送到周总理那里，请他下决心。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要同陈云同志商量一下再定。陈云同志提出对粮食要统一计划、统一调拨。他说，差额调拨的办法不能够应付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中国国家大，每年都难免发生自然灾害，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灾害。如果搞差额调拨，原来粮食多余的省份，遇到大灾，不但调不出粮食，还需要调进。可是，差额调拨数字已经定了，就很不好办。经过和陈云同志商量，周总理下了决心，说，就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这只是一个例子。属于财经工作方面的重大问题，要进行决策的时候，周总理常常是要同陈云同志商量后才下决心。

再说刘少奇同志对陈云同志的看法。我只想说一件事。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以前没有预计到的。当时我们的经济本来就很困难，又新增加二、三十亿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少奇同志决定专门开会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的所谓西楼会议。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陈云同志全面地讲了我国财经工作上的问题以及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完全赞成这些意见。少奇同志对陈云同志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

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后来开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在富春同志、先念同志讲话之后，陈云同志发表了一篇讲话，就是这本书里倒数第二篇文章《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陈云同志一讲完，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我当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实可行。讲完以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小平同志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陈云同志这个讲话经过整理，少奇同志主张用中央的名义把它转发全国。而且，他还对怎么写转发的批语提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记得有，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少奇同志的意见是，困难有十分，只讲七分、八分，讲少了，工作被动；把困难估计够，甚至于估计得多一点，我们工作主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部署工作时，“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①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之

①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

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主张要陈云同志当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他有意见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的同志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这样就确定富春同志当财经小组的组长，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小组的成员。后来在讨论批转陈云同志的讲话时，少奇同志说，有同志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富春同志讲，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当时陈云同志不在场，他知道后还是推让。少奇同志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西楼会议通过了陈云同志的讲话，通过了中央转发的批示以后，少奇同志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的，可是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第二天，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就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起草了一个批示，会议上是通过了的，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少奇同志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毛泽东同志看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看了中央常委的批示，说同意发。这样，文件就发出去了。

在这以后，召开了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同

志讲了几点意见，就是这本文稿里的最后一篇。记录下来，整理后经陈云同志看过，在小范围里头印发了。

陈云同志那时身体不太好，讲话后到上海休息去了，中央财经小组的会议就由周总理主持。后来，周总理也作了一篇很长的发言，补充和发挥了陈云同志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夏天，各大区书记和政治局同志一起开会，讨论周总理的这个讲话。会议的意图是，如果大家同意这个讲话，就转发全国。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赞成，也有个别同志，例如柯庆施同志就不赞成。他这里挑一点，那里挑一点，归结起来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对形势已经作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少奇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对形势的估计，应该按照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财政赤字，所以，那时候对经济形势可以作那样的估计。现在情况变了，发现财政有二、三十亿的赤字，我们的估计也应该跟着变化，这是唯物主义嘛，这是实事求是嘛！作了这个估计之后，我们又经过集体讨论，不是个人说了算，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怎么能够说不对呢？然后少奇同志又讲了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记得他说：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对形势作了估计，会后毛泽东同志到河北、河南视察，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对形势重新作了估计，同北戴河会议的估计大不相同，提出了当时存在剥夺农

民的严重危险。这不是变了吗？那时候谁也没有说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还说，一九六〇年，周总理主持搞了一个农村“十二条”，这对于扭转农村形势，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到了年底，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对农村情况还不摸底，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每个省委书记亲自调查几个公社，几个工厂，几个商店。他自己带头，组织了三个组，分别到农村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决定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是因为，经过调查发现，“十二条”还没有全部解决问题，它解决了一个从上而下“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了，办法也应该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

会后，少奇同志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讲话，也就是现在同志们拿到的这本文稿的大部分讲话和文章，都找到编出来了，大概有四、五万字。还搞了一个提要，一万多字。陈云同志对编辑他的言论，曾经几次坚决表示不同意，尤其不同意印发。少奇同志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财经小组的成员和中央常委的同志看看。少奇同志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同志，说他叫几个同志选编了陈云同志的文章，印发给少数同志参考，现在送上一份，请你有空的时候翻翻。也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是看了，还是没有看，一直

到一九六二年八、九月开北戴河会议时，都摆在他桌子旁边，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

小平同志一向也很尊重陈云同志的意见。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油料统购统销，这个意见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完全赞成。在三年调整时期，小平同志大力支持陈云同志的工作。陈云同志休息后，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身上。一个国务院，一个书记处，领导着经济调整的工作。

小平同志对陈云同志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提了五条意见，其中包括每年进口两千万吨粮食这个重大决策。陈云同志说，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了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陈云同志还说，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陈云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而又稳重。对于陈云同志这些意见，小平同志完全赞成。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初，国务院讨论年度计划，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同志出来当主任，主持财政经济工作。先念同志说，他当助手，当副主任。这个意见经中央常委讨论，作出了一致同意的决定。同年三月中央常

委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对国民经济要进行三年调整，要降低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高指标。例如，八五年六千万吨钢的指标，陈云同志认为是根本达不到的，能够达到四千五百万吨，就谢天谢地了。到二〇〇〇年能够达到八千万吨也就不错了。陈云同志说，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小平同志完全赞成和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说，中心的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小平同志还说，陈云同志提出，二〇〇〇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的时候了。钢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八千万吨钢，并不一定比二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一九七九年九月，陈云同志在财经委员会就经济问题讲了十一条重要意见，再次指出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还对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借外债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陈云同志这些意见，小平同志都是完

全赞成的。

十一大前后，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多次提出要补选陈云同志进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王震同志第一个提议，补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三中全会选举了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对此，大家都很高兴，众望所归嘛。

最后，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看待陈云同志的吧。

解放后的头几年，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是完全信赖、完全支持的。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意见，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到了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能什么事情都照搬苏联。他在批评我们的工业建设、教育制度，不仅是设备成套进口，而且连管理制度也是成套进口这方面的毛病的时候，总要讲，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

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些冒进，财政、信贷多支出了近三十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紧张。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讲话中都说过，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这一年的六月间，少奇同志主持开政治

局会议，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会议责成中宣部写一篇社论，这就是这一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社论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订得太高了，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篇社论经过少奇同志看过以后，送给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同志在南宁会议上讲，他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说这篇社论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反对毛泽东。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人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①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间写的。到了一九五六年，实际工作中确实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同时，提出反对急躁冒进，这是合乎客观实际的。社论没有引毛泽东同志反对右倾保守的话，而只引了“人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

①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4页。

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应该承认，社论在引证的方法上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否定当时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偏向，认为没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和克服这种偏向，这就不对了。

一九五八年闹钢铁翻番、高指标，“大跃进”。陈云同志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到了这一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毛泽东同志说要压缩空气，要压低指标。五九年的钢铁生产指标压来压去，压到二千万吨，陈云同志不赞成这个数字，认为还压得不够。当时粮食生产也提出了年产七千亿斤甚至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陈云同志也不赞成。当时压缩指标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大家都头脑发热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纠左，许多同志还不理解，还想不通。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上海会议，又一次压指标，钢铁由武昌会议的二千万吨压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后来又压到一千五百万吨，毛泽东同志还不放心。那次会议陈云同志没参加，毛泽东同志请陈云同志专门研究一下，一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究竟靠得住靠不住，给他一个任务，落实钢铁的指标。陈云同志经过三个月的系统的调查，和富春、一波等同志共同提出，钢的指标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材落实到九百万吨。一九五九年五月，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